

揭秘“获国”

本报记者张宋红 马思嘉

西周，中华文明史上的辉煌一页，它以礼乐昌明、政通人和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溯历史长河，那个遥远又苍茫、神秘又壮阔的远古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璀璨辉煌？

2017年4月的一天，宁夏固原市彭阳县一如既往。一场红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主持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谁也没想到的是，千百年来一直以雄浑质朴示人的黄土之下，居然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探方之中，黄土被层层刮开，一个古国连同它的宫殿、城墙、护城壕、渠系系统等逐一显现，被封印了数千年的文明重现人间，史料失载的西周诸侯国——获国，从此进入大众视野。

一片甲骨，名动天下

谈及7年前的这次发现，姚河塬考古队领队马强记忆犹新。

那天，烈日当头，他和一群青年考古人在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北部一片遗址区展开清理发掘工作。起初，因墓葬盗扰严重，他们对这片遗址是否还能发现重要文物不抱太大希望，但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多件重要文物陆续出土。

多年经验告诉马强，眼前这片遗址不简单。于是一个更加详尽的考古发掘计划在他的脑海里迅速形成。经过一次次细致勘探、清理，越来越多的文物陆续出土，人们对这片遗址的认知也被刷新。

它，占地92万平方米，坐落在便于防御的断崖之上，黄河支流泾河的青色血管在此交汇。依水而建的都城井然有序，在城墙和护城壕保护下，王室贵族居住在内城，而环绕四周的外城则是平民百姓的家园，更远处则是农田、狩猎场。

它，有着占地8000余平方米的诸侯国君族墓葬区，以及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区等核心遗址。

它，迄今已出土3000余件文物，品类繁多、工艺精美，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骨角牙蚌器、刻辞甲骨等。

如此重要的遗址，发现初始却没有姓名。这些留在人间的残存片段，能还原出那个世界吗？

带着疑惑，马强翻阅厚重的史籍。“在史书上，没有发现西周王室在西北分封诸侯国的记载，所以我们最初对遗址的性质、地位都不确定。”

因其神秘，更激起考古队员的探索欲。在随后的发掘整理中，有30多块甲骨残片被发现，十几片上还刻有文字。在其中一片甲骨上，“曰：由稼稷”“刻辞清晰，“稼稷”两字，更是其他字的几倍大，突出了对农业生产种植“小米”的重视。从考古浮选的大量炭化种子中，“谷子（稷）”正是姚河塬人群的主要农作物。放大的“稼稷”二字，让今人在横竖撇捺、一笔一画中，窥见那些鲜活生命的脉动，那些对丰收眼望欲穿的期待，那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黄土尘封之下，分明是一群人的家，是一群人的国，这里有金戈铁马，也有袅袅炊烟。他们到底是谁？他们从哪儿来？他们又为何消失？

在姚河塬遗址发现前，宁夏地区发现的西周遗址只有一处——1981年固原市出土的孙家庄西周墓。考古团队对两处遗址出土的文物作了比对分析，发现孙家庄遗址出土的车事、车轴装饰和姚河塬遗址出土的一模一样。马强认为，这些青铜器也属于姚河塬铸铜作坊生产，这座墓葬的主人就是获国派出去巡查巡狩的小队长，身先士卒，最终埋葬于此。

而另一片甲骨的发现，揭开了这神秘大墓的一角。

在编号为M13的“甲”字形大墓的墓道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块卜骨，上面有“入戎于获侯”的刻辞，意思是“把抓获的戎人敬献给获侯”。卜骨上的“获侯”二字，让孜孜探索的考古队员看到了一丝光亮。难道，这方寸间真的埋藏了那个3000年前的谜底？

周灭商后，广封诸侯，以形成屏障拱卫周王

室。一时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星罗棋布的诸侯国让周天子势力不断扩张，甚至抵达东海之滨。但目前发现的史料中，关于周人在西北的军事活动却只能查到少许，也并没有记载分封的诸侯国中有个“获国”。

那么，这个横空出世的“获国”是否真实存在？仅凭一片甲骨和五字刻辞就承认有这个“获国”是否客观严谨？考古团队的求证之路还很漫长。

经过8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队确认姚河塬城址面积92万平方米，清理发掘城墙、护城壕、诸侯国君家族墓地、普通平民墓地、官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水网、道路等重要遗迹。根据对姚河塬遗址墓葬区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碳十四测年，以及对出土器物的断代等结果表明，姚河塬遗址从商代晚期延续到春秋早期，时间跨度大，内涵丰富。典型的西周国君墓葬——“甲”字形大墓和竖穴土坑墓，以及象征王权的青铜铸造作坊等，进一步佐证了获国的地位。

“获国遗址的等级和周王室在东方分封的齐、鲁、燕等是一致的，只不过规模稍小，但它的好处在于‘五脏俱全’。我们在其他西周诸侯国没有发现的元素这里都有，感觉像是把西周都城该有的有局和文明要素全部打包转移到了这里，对于我们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诸侯国布局有重要意义。”马强说。

在姚河塬遗址未发现前，大家普遍认为，周人在西周中期便向东退守，逐渐失去了对西北的控制。而姚河塬遗址的发掘，充分体现了周人在西北地区的军事扩张。六盘山下的获国，在西周早期就被分封，并一直存续到春秋早期，贯穿整个西周历史。西周末年，犬戎兵临镐京城下，杀周幽王于骊山，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开启春秋战国时代。在此之前，获国一直为周王室镇守西北疆域。

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对研究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周王室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具有空前意义。因其重要性，姚河塬遗址集齐了考古界的全部奖项，如2017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获得“田野考古二等奖”，2020年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亦称六大考古发现）”，2022年入选“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等，这在国内遗址中也属罕见。

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专家给予姚河塬遗址“五个最西北”的高度评价，即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最西北的铸铜作坊遗址。

最能够让考古学者认定获国国君是殷人的证据，则埋藏在高等级墓葬中。

这些墓葬聚集在遗址区北部最高处。海拔1636米的高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40座西周墓葬，面积约8000平方米。诸侯国四代国君的家族墓被精心设计在核心位置，2座春秋时期祭祀坑和用于陪葬的6座马坑、6座车马坑以及壕沟等将整个墓葬区环绕在内。

考古队员发现，几乎所有的墓葬底部中央，在棺椁之下墓主腰部位置，都被有意挖出一个坑，考古界称其为“腰坑”，里面皆有完整的犬骨。这些狗，以两只前腿绑缚在后背上的奇特姿态殉葬。而“腰坑殉狗”是殷人葬俗，这是证明“以殷制戎”的直接证据。

“墓葬中发现的殉狗大多不超过两岁，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岁。我们推断，当时存在一个职业，专门饲养用于殉葬的狗。”侯富任说。

除了“腰坑殉狗”的殷人葬俗外，马强还发现了另外一些极其特殊的墓葬形制。比如：在四代国君家族墓中，主墓与亲属墓通过未挖到底部的过道相连，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陪葬马坑内，下层马骨排列整齐，上层则普遍散乱，异于主流葬俗；“刀把形”马坑旁有一人殉葬，正处于“刀把”位置；多座墓葬中的人骨在下葬时便被散乱分布在棺室、椁室和二层台等处，属于“碎骨葬”；陶器等陪葬品也都被随意打碎并散乱埋葬，属于“碎物葬”……

如果真的是殷人，周灭商时他们遭遇过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从河南移民来到宁夏？这段往事，在姚河塬遗址里能找到答案吗？

从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来看，西周的统治者不像殷商那般血腥嗜杀，建国伊始，周天子便向民众展示了其仁慈宽厚的一面。孔子对此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世帝王也都推崇周礼作为文治典范。周灭商后，不但没有将殷人赶尽杀绝，反而给一部分殷民分封土地，让其镇守危机四伏的西部疆域。

获国所在的固原市，在西周时期被称为“大原”（或“太原”），是华夏民族劲敌猃狁、戎人等的地盘。马强等人认为，周王室把殷遗民安置在西北的姚河塬，既让他们远离王都，避免起兵反抗威胁到“自己”，也是利用他们作为军事前哨和戎人对抗。

据史料记载，周穆王和周宣王都曾发起过对戎狄的征讨和平叛。无奈，敌方实力强大，不仅未能获胜，反而在多年的拉锯战中耗伤国力，最终亡

西周往事，以殷制戎

从2017年到2024年，两千多个日出日落，姚河塬已成为考古团队生活的重心。

经过孜孜不倦的深耕，马强又有了重大发现：获国国君很可能就是殷人，而非周人。腰坑、角坑、殉狗、殉人、殉牲等埋葬习俗，商式簋、鬲、盆等出土器物，锁定了获国国君是殷遗民群体。眼下，他的新书《以殷制戎：泾水流域商周聚落与社会研究》正在筹备中，这些年考古勘探、分析研究的新成果将在书中系统呈现。

如果真的是殷人，周灭商时他们遭遇过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从河南移民来到宁夏？这段往事，在姚河塬遗址里能找到答案吗？

从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来看，西周的统治者不像殷商那般血腥嗜杀，建国伊始，周天子便向民众展示了其仁慈宽厚的一面。孔子对此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世帝王也都推崇周礼作为文治典范。周灭商后，不但没有将殷人赶尽杀绝，反而给一部分殷民分封土地，让其镇守危机四伏的西部疆域。

获国所在的固原市，在西周时期被称为“大原”（或“太原”），是华夏民族劲敌猃狁、戎人等的地盘。马强等人认为，周王室把殷遗民安置在西北的姚河塬，既让他们远离王都，避免起兵反抗威胁到“自己”，也是利用他们作为军事前哨和戎人对抗。

据史料记载，周穆王和周宣王都曾发起过对戎狄的征讨和平叛。无奈，敌方实力强大，不仅未能获胜，反而在多年的拉锯战中耗伤国力，最终亡

于戈未止息，但四海已视同一家。重生的获国还敞开胸怀接纳了其他飘零的族群。同是制作陶罐，但不同的纹样、肌理、造型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审美或意志。马强发现，获国出土的各类陶罐中，有商周文化，还有寺洼文化、刘家文化、本土文化等，这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来自不同文化属性的人们聚集在姚河塬一带，交流互鉴、和谐共处。

“也许获国的殷人最终走向了周王室的对立

遗产民间文学项目类别名录

记者走访了号称“天下祖庭”的四祖寺和五祖寺。四祖寺所处地面比较平坦，很适合四祖道信禅师力主的“农禅并重”，就是要求僧人开荒种地、自食其力，在平凡劳作中实现农禅双修。这一禅修原则后来由五祖弘忍禅师发扬光大。五祖寺至今仍保留着“慧能春米处”的复原场景，六祖慧能日复一日为寺院僧众舂米，因身材瘦小而腰悬重石“为法忘躯”，在重复的劳作中悟到了非树非台、明心见性。

五祖寺山势较陡。废名先生在其散文《五祖寺》中，讲述了自己幼时大病初愈，随大人去五祖寺，被留在寺外一天门的茶铺里过门不入，“过门不入也是一个圆满，其圆满真仿佛是一个人的圆满，就在这里为止也一点没有缺欠。”

废名成年后多次游览五祖寺，却再无记述，或许是因为有过童心的禅悟就够了。如今人们去五祖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山门进出处的匾额，进门题“放下著”，出门题“莫错过”。寺内僧人解释说，这是提醒人们上山悟禅放下羁绊，下山入世“满血复活”。

试解秘笈，“黄冈密卷”秘何在

清乾嘉时期史家陈诗在其所著《湖北通志·人物志序》中说：“惟楚有才，黄郡实当其半。”有关地方史志专家整理出黄冈历代名人达1600多位。

黄冈何以成为孕育人才的热土？近年来已有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和史志专家予以关注和研究，有的还提出范畴更为宽广的“黄冈学”研究课题。记者结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和采访感受，试从历史地理、人口迁徙、家风人文三个层面予以归纳解读。

一是由区划沿革、地理方位、地形地貌综合形成的历史地理因素。在《尚书·禹贡》的记载里，黄冈大致以巴河为界，分属荆州、扬州。以后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分裂时期，黄冈长期处于不同州国的“交叉地带”，先后分属吴、楚、吴、魏、南朝、北朝，

▶这是位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的姚河塬遗址（5月9日摄，无人机照片）。
本报记者 冯开华摄



于戎人之手。《史记》中也有描述：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

“以殷制戎”的推论源自遗址中丰富的文物佐证。“如果没有姚河塬遗址，这些推论都很难成立。”马强说。

首先，姚河塬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获国人不得不直面戎人等异族。国都选址在便于防御、水源充足的断崖之上，且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军事壁垒性质明显。

其次，高等级墓葬区内用于陪葬的马匹数量高达120多匹，在铸铜作坊区等地还发现了被食用过的马骨。“马匹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但获国在马匹使用上异常慷慨，且碳氮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这里的马匹是人工喂养和放养并存。我们推测，获国很可能就是西周王室的一处养马基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动物考古学专家侯富任说。

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对研究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周王室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具有空前意义。

因其重要性，姚河塬遗址集齐了考古界的全部奖项，如2017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获得“田野考古二等奖”，2020年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亦称六大考古发现）”，2022年入选“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等，这在国内遗址中也属罕见。

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专家给予姚河塬遗址“五个最西北”的高度评价，即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最西北的铸铜作坊遗址。

最能够让考古学者认定获国国君是殷人的证据，则埋藏在高等级墓葬中。

这些墓葬聚集在遗址区北部最高处。海拔1636米的高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40座西周墓葬，面积约8000平方米。诸侯国四代国君的家族墓被精心设计在核心位置，2座春秋时期祭祀坑和用于陪葬的6座马坑、6座车马坑以及壕沟等将整个墓葬区环绕在内。

考古队员发现，几乎所有的墓葬底部中央，在棺椁之下墓主腰部位置，都被有意挖出一个坑，考古界称其为“腰坑”，里面皆有完整的犬骨。这些狗，以两只前腿绑缚在后背上的奇特姿态殉葬。而“腰坑殉狗”是殷人葬俗，这是证明“以殷制戎”的直接证据。

“墓葬中发现的殉狗大多不超过两岁，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岁。我们推断，当时存在一个职业，专门饲养用于殉葬的狗。”侯富任说。

除了“腰坑殉狗”的殷人葬俗外，马强还发现了另外一些极其特殊的墓葬形制。比如：在四代国君家族墓中，主墓与亲属墓通过未挖到底部的过道相连，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陪葬马坑内，下层马骨排列整齐，上层则普遍散乱，异于主流葬俗；“刀把形”马坑旁有一人殉葬，正处于“刀把”位置；多座墓葬中的人骨在下葬时便被散乱分布在棺室、椁室和二层台等处，属于“碎骨葬”；陶器等陪葬品也都被随意打碎并散乱埋葬，属于“碎物葬”……

如果真的是殷人，周灭商时他们遭遇过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从河南移民来到宁夏？这段往事，在姚河塬遗址里能找到答案吗？

从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来看，西周的统治者不像殷商那般血腥嗜杀，建国伊始，周天子便向民众展示了其仁慈宽厚的一面。孔子对此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世帝王也都推崇周礼作为文治典范。周灭商后，不但没有将殷人赶尽杀绝，反而给一部分殷民分封土地，让其镇守危机四伏的西部疆域。

获国所在的固原市，在西周时期被称为“大原”（或“太原”），是华夏民族劲敌猃狁、戎人等的地盘。马强等人认为，周王室把殷遗民安置在西北的姚河塬，既让他们远离王都，避免起兵反抗威胁到“自己”，也是利用他们作为军事前哨和戎人对抗。

据史料记载，周穆王和周宣王都曾发起过对戎狄的征讨和平叛。无奈，敌方实力强大，不仅未能获胜，反而在多年的拉锯战中耗伤国力，最终亡

于戈未止息，但四海已视同一家。重生的获国还敞开胸怀接纳了其他飘零的族群。同是制作陶罐，但不同的纹样、肌理、造型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审美或意志。马强发现，获国出土的各类陶罐中，有商周文化，还有寺洼文化、刘家文化、本土文化等，这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来自不同文化属性的人们聚集在姚河塬一带，交流互鉴、和谐共处。

“也许获国的殷人最终走向了周王室的对立

面，才导致了西周的灭亡。”马强说。尽管仅仅是猜测，但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的意义所在。历史文献记载缺失的内容，因为无数的考古发现研究变得生动丰满；历史脉络里破碎流逝的细节，因为无数的遗址遗物变得清晰准确；历史长河里散落的人类文明，因为无数人的敬仰传承变得生机勃勃。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马强的这个大胆猜测能得到考古实物的证实。

“百工”兴盛，熠熠生辉

一把象牙梳，在文物修复师手中复活。梳齿细密，阴刻饕餮纹，饕餮面部镶嵌象征王权礼器的绿松石，彰显权威。上古神兽目光如炬，这只见证过神灵获国的眼睛，历经数千年依旧在凝望。

安定下来的获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渠而饮，耕田而食，慢慢积蓄力量，创造更加多元的文明。这里出土的玉器造型多样，有璧、璜、蚕、牛、鹿、螳螂等；骨笄、骨簪、骨锯、骨制护甲的制作十分精良；镶嵌螺钿的彩绘漆器、蚌壳制品构思巧妙，鲜活地展现了制作者高超的审美和惊人的匠心——这是获国留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当庞大的城池、完善的防御、幽深的墓坑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考古队面前